

七十自述

羅光

在祥和的燈光下，對着案上的十字架和仁慈聖母像，追憶七十年來的經歷，心裏充滿了向上的感激之情。七十年來，世界經過了兩次大戰的浩劫。中國則由辛亥革命，陷入軍閥的割據，然後由北伐而成功統一，却遭受日本人的侵略，共產黨乘機竊據大陸，國民政府遷駐臺北。中國的天主教會，在民初有雷鳴遠神父開創傳教新途徑，剛恒毅總主教來華任第一任宗座代表，創立中國的天主教會新紀元，選任中國國籍主教，創設輔仁大學，革新修院教育，遣派修士出國留學。不幸後來遭受共匪的迫害，大陸教會備受摧殘。整個天主教會，七十年代產生了前所未有的革新運動，若望二十三世開了端，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集了大成，禮儀改革，經文改革，體制改革，思想改革，形成了一種深而大的騷擾，保祿六世用盡智慧和耐心，引導改革趨向正道。在這樣震盪不安的七十年中，度過各種不同的生活，竟能安安靜靜地有驚無險，明顯地感到有天主的恩祐。

讀書。教書。寫稿。研究

七十年前，在衡陽南鄉一個不窮而勞苦的佃農家中出生，家中人四季勤勞。祖父早去世。

大伯父持家，家父經商，三叔和四叔耕田，四戶同居，祖母在堂。農田和水塘的氣味，充滿了肺腑。我愛青青稻苗，我愛車水時的農歌。夏天稻場曬穀，在月夜裏和弟弟、堂姐妹閒聊守穀。農家四壁所有，樸素誠實，忍苦耐勞，塑刻了幼童的天性。祖母信教虔誠，家中有幾代天主教信仰的傳統，小孩在家在教堂常浸融在經詠歌聲中。小學和初中的課程很輕鬆，出了學校，我天天在田埂上水塘邊弄草弄魚，皮膚焦黑。長大以後到了老年雖每天坐在辦公室和汽車裏，頭頂不見太陽，皮膚仍舊黝黃，這種顏色乃是農家子的本色。

高小三年級，鄉間小學停辦了，乃被送到衡陽市讀書，後來又被送到聖心修院，讀了七年。在十九歲時，被送入羅馬傳信大學。考了哲學博士，繼續神學。神學畢了業，到羅馬拉德朗大學讀法律。考取法學博士後，整裝回國，却因義大利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航運不通，便留在羅馬傳信大學任教，續攻神學博士。

二十幾年的讀書生活，養成了習慣。每天有讀書的時間，也有寫稿的時間。第二次大戰期間，中國和教廷建立外交關係，設立駐教廷使館，我受聘為使館的教務顧問，每天到館辦公，出了

使館，就坐在寓所房中，天天不離書本和稿紙。現在屢屢有人一面驚訝，一面懷疑，我任總主教、任校長，那裏還能寫文稿書籍？這其中唯一秘密在有日課表，而且守日課表。讀書寫稿不是工作，而是生活；別人放假，我就在家寫稿；別人和朋友聊天散心，自己則坐在書案看書；從來沒有放假休閒一天，出外旅行也帶着書和稿紙；只是眼睛有時抗議，提出休息的要求。

民國五十年，我受任為臺南主教，輔仁大學那時正在復校，首先成立哲學研究所，于斌總主教校長要我教授形上學，我兩週來臺北一次，授課四小時。教了兩年，因忙在羅馬參加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不能繼續教課。民國五十五年，我調任臺北總主教，于總主教和張曉峯（其昉）先生又邀我到輔大和文化學院的哲學研究所教書，一直教到現今。合計起來，已經在大學教了四十多年。教書就是讀書，每次上課以前，必要改寫講義，學問是漸漸積起來的，也是辛苦地賺來的，求學還不能太濫，祇能照自己的嗜好，自己的才智，自己的時間，選定研究目標，天天去做研究，總可以有成。

對文學美術的興趣

自己天性喜歡文學，也愛好美術。雖是農家出身，對於建築，對於室中陳設，則講究美觀。在臺南，在臺北，在輔仁大學，都表現這種嗜好。在臺南造了一座宮殿式的主教座堂和書院式的碧岳神哲院，教會人士個個稱好。在臺北建造了外中內西的總主教公署，一時物議沸騰，批評聽堂太大，大理石過奢。自己平時喜歡種花養鳥喜愛小狗，一天的消遣乃牽着小狗散步，晚間看半小時電視。

在羅馬讀哲學神學時，沒有一天放棄了中國古文古詩，攻讀的時間不多，每天只一刻鐘，但是每天必讀。在衡陽市讀高小三年級那一年，住在姑丈家裏，姑丈藏有幾十種古本小說，便每一本都讀了：水滸傳、三國志演義、封神榜、西遊記、今古奇觀、彭公案、施公案、薛仁貴東征、聊齋誌異、儒林外史、五虎平南、列國誌，似乎還有別的幾冊，忘了書名。金瓶梅和紅樓夢兩書則沒有。一生所看的中文小說，除在家中看了父親的粉裝樓、七俠五義外，都是那一年所看的。高小第三年課程雖已在鄉讀過，然而把數學和英文還是就誤了。暑假，考高中入學考試，自己便吃了虧。

因為愛文學，在羅馬教書時，所看的外國文學書很多。拉丁文的散文和詩，英文的詩集，法文的小說，義大利文的小品文和新詩，德文詩選，讀了幾十種，莎士比亞、但丁、歌德的詩集都讀過。義大利當代文豪巴比尼 (Giovanni Pupini) 的散文集，戲劇家畢朗德洛 (Luigi Pinandello) 的劇本，女詩人耐里 (Ada Negri)

的詩集。另外又喜歡閱讀法國學院院士莫洛雅 (André Maurois) 的傳記，和義大利新派的聖人傳。讀多了，自己也寫，第一本書陸徵祥傳出版後，讀者多說好，我就陸續寫了聖庇護第十傳、徐光啓傳、利瑪竇傳、耶穌傳、聖母傳；又寫了些新詩：羅馬晨鐘、海濱夕唱；散文集則最早有：人生的體味，到臺灣後有：羅馬四記、臺南五年、臺北七年。在羅馬時，看謝壽康大使畫竹，他又鼓勵學畫，自己開始習畫寫字。沒有老師，祇看畫集，但定下每星期四和星期日下午作畫，信筆塗鴉，三十年後，畫馬畫竹似乎有幾幅使自己滿意，臺南馬健飛畫家看到我的畫對我說：「筆力很強，膽子也很大！」沒有學過畫而作畫，膽子當然不小。當陸徵祥傳出版後，陳滄波委員會在新聞天地評說：沒有研究中國現代史而寫陸徵祥的傳，實在不相稱。自己也知道不是寫歷史傳記的人，而是從文學方面寫傳記。

從法律到中西哲學

愛好文藝的心情，在研究學術的努力中，漸漸消逝，當進入拉德國大學研究法律時，對羅馬法律發生興趣，買了一些羅馬法的書籍，自己想想將來回國教授羅馬法。又買了幾種中國法律思想史和法制史，作羅馬和中國法的比較研究。但是這種研究的興趣，留下的遺跡祇是分析事情的頭腦，法學的書籍早已束之高閣了；雖然民國五十七年受教廷任命作教會法典修改委員會委員，有十年的時間參加修改法典的工作，但我研究的興趣已經不在法學了。

代替研究法學興趣的另一種學術研究興趣，則是研究中國哲學。遠從民國二十五年夏天，剛在神學院畢業，被任命在傳信大學教授中文。教的課目，有為全校中國學生的中國哲學思想，有為傳教學院的中國宗教思想史和中文，有為法律學院的中國民法。給外國學生講中國思想，要明瞭，要簡單，要有系統。便用義大利文出版了兩冊講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書。給中國學生講中國哲學，五年級的同學合班上課，每週兩小時。我教了二十五年，寫了兩冊中國哲學大綱。

自己是研究西洋哲學的士林哲學，受過聖多瑪斯哲學思想的陶冶，知道研究哲學的方法。胡適之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讀過好幾遍。我贊成胡適之用西洋哲學研究法研究中國哲學，但於對他和馮友蘭兩書的思想，則認為還沒有深入中國哲學的中心。

為介紹士林哲學，寫了一部理論哲學，一部實踐哲學。這兩部書稱不起是著作，祇是用系統的方法作士林哲學的介紹。在解釋士林哲學的每一部份時，加入中國的哲學思想。當時，我還在羅馬，對於中國哲學祇有普遍的認識，不能把中國哲學和士林哲學作比較研究。民國四十五年主編新鐸聲月刊，月刊在新加坡出版，每期一百頁。在羅馬編輯後，郵寄新加坡付印。每期篇幅既多，來稿常不足篇數，自己需多寫。那幾年陸續寫中國哲學的研究文章，後來集成儒家形上學一書。這本書去年由輔仁大學出版社再版，增加了許多篇章。一種哲學一定要有自己的形上思想作基礎，這一點是士林哲學教給我的。大家却都說

儒家沒有形上學，甚至於說中國哲學沒有形上學，祇有倫理學，最多是老子的『道』有些形上的色彩。誰能相信儒家沒有形上學呢？乃由宋明理學家的理學抽出幾個形上的觀念，以士林哲學的方法，予以系統化，不就是儒家形上思想嗎？但是寫這本書的時候，我還沒有研究易經。

易經生生中心思想

到了臺北，在輔仁大學和文化大學教中西哲學比較研究，所講的是中西形上學的比較，同時在輔大開易經哲學課，深入易經的中心思想，把握了易經的『生生之謂易』。西洋形上學研究『存』、『有』為實際的『存有』，『存有』可以

從本性方面去分析研究，說明『有』的意義。然而『存有』也可以從實際存在方面去研究，『有』在實際存在上究竟怎樣？『有』的實際存在為一常在變易的『存有』，常在變易的『存有』即是易經的『生生』。易經的『生生』觀念乃是儒家形上學的中心觀念，也就是研究的主题。這個生生的觀念在漢易、宋明理學，以及清初王船山思想裏，成為一貫之道，把中國儒家思想連成一個系統。

後來，讀唐君毅先生晚年的著作，又讀方東美先生的著作，體會到他們兩位對於中國哲學有深刻的認識，而他們兩位也歸結到易經的『生生』。尤其是方東美先生常以生生為中心思想，發揮宇宙的和諧藝術美。近來，我讀熊十力的著作，驚訝他從佛教思想回到易經的生生，以破佛教的空。我近年也研究佛教思想，佛教思想當然不

是易經生氣洋溢的宇宙觀，然而在虛空裏追求常樂我淨的自我，似乎企圖摧毀輪迴的生生，實際上仍是在禪觀裏發揚無量無限的超越性生命。

宇宙為一氣，一氣運行分陰陽，陰陽結合成萬物。氣運行不停，萬物生生不息。天地萬物無心，自然變易，人受清氣以生，有靈明的心，人心乃是天地之心。人心體驗天地萬物的生生而有『仁』，『仁』為生命的精神化，人心的生命乃精神的命，精神的生命為仁義禮智的生命。儒家倫理思想的中心在於『仁』，『仁』的根底在於『生』。易經的生生觀念，便是儒家倫理學的形式上基礎。

在六十歲時，看到方蒙神父的方蒙六十自定稿。他說他是仿效王船山，王船山有船山五十、六十、七十的自定稿。我便心想在十年內要完成一種著作，即是中國哲學的思想史。今年我已經七十歲了，這本著作一共七冊，已將完成。從歷代的中國哲學思想裏，我更看到『生生』觀念在中國哲學思想的地位；而且在未來中國哲學的發展，這種觀念還是一個很好的基礎。

羅馬三十年教與學

感謝天主在研究學術的路上，漸漸引我走上中國思想的大道，看到大道的目標。又感謝天主在獻身於教會的生活中，能夠得了各種不同的生活經驗，在複雜的環境裏為教會在國家服務。

一個獻身於基督的男士，他是神父，神身抱守獨身貞操，照顧教友的宗教生活。民國二十五年我在羅馬受任為神父，繼續讀法律，開始教書

，沒有直接照顧教友的職務。但是每逢星期日，必到羅馬一本堂區的教堂服務，參與照顧教友宗教生活的工作。民國三十四年，每早清晨五點半出發，搭乘公路局電車往聖心婢女修女院舉行彌撒聖祭，給女學生主持懺悔告解禮，直到民國五十年離開羅馬來臺灣，十八年的時間在春夏秋冬的季節裏，清晨常到這座修女院，從未覺到勞累，唯一的倦態，則是下電車上山走五分鐘的路時，迎面有多天的冷風，吹到眼睛，使我患了流淚的小症，心中所有的安慰則是修女們在臨別時說：「十八年，從未有一天晚到」。

在羅馬留學時期的經驗，有一種強烈的國際感和民族意識。傳信大學為一座天主教國際大學，大學的宿舍按照修院制，三十幾國的同學共住一起。規則很緊，紀律很嚴。同住的同學，國籍不同，生活則彼此不離。每一國的學生都想表示自己是自己國家的人，掛國旗，參加本國同學會，却又天天看別國同學的舉止行動，大家都求適合同一的規律，彼此互相有點同化。

教書的經驗很長，所教的學校則祇有兩座：一座是傳信大學，一座是輔仁大學。中國文化大學的研究生則是到家裏來上課，在開始教課的第一個學期，即是在十五年前的秋天，到中國文化學院哲學研究所授課，常常找不到教室；在第二學期便改在家裏授課，沒有教過五十人一班的經驗，祇有一年在輔大哲學系教形上學，一班是五十人，素常研究所的學生不多，學生面貌很熟，姓名却生疏，傳信大學的中國學生在抗戰前後，人數在三十人左右，中文教授教書，似是向家中

弟弟們講書的心情。每堂課以十分鐘述說一週來國內新聞。這是由于斌神父在教書時所留下來的習慣，于斌神父曾在傳大教了四年，民國二十二年冬天離開羅馬，到北平就任中國公教進行會總監督張潤波神父繼任教授，張神父則祇講四書，不講國家大事。民國二十五年他們兩位教授同時被任命為主教。從那一年起，自己在傳大教書二十五年。在傳大沒有考學生的經驗，中國學生一年祇作四篇文章。別的學生每年祇十分鐘的口試，在輔大和文化大學，期中期末，學生要交研究報告，講書時，衡陽鄉音很重，學生不好懂。想起當第一年在羅馬聽于斌講書，開始幾個月，竟聽不懂他的國語。想起自己不是專任教授，主要工作是管理教務，教書祇是自己喜歡教書。每次辦出國手續或在飛機上填入境卡，填職業一項，從來沒有填為教授，祇填寫天主教主教或校長，實際上主教和校長都不是職業，祇是一種職務。但我並不以教書為職業，而以教書為一種讀書的方式，便不覺得苦。不過當學校放假時，却也覺得輕鬆。

受任臺南首任主教

民國五十年被任為臺南主教。自己從來沒有在臺灣住過，祇來觀光一次；又沒有直接管理教會事務的經驗，更不知道臺南的情形。任命既是來自教宗，代表天父的聖意，我平靜地接受了任命，從若望廿三世接受了祝聖主教禮，東裝束歸。離開居住了三十年的羅馬，心中一時不能平靜了。看到替我管了十年家的老女工，打着家中各

色的黃鶯，摸一摸房中的傢具，和丟下來的書，心中悽悽地好幾天。在羅馬已經安居了，有一定的工作，安安靜靜地教書辦公，家中有人管理，外面有相好的朋友。於今雖然說是回國，實則是到一個陌生的臺南，到完全不相識的人中去工作。可好，當我在羅馬接受授職典禮時，那時因着共匪竊據大陸不能回國而留在歐洲各國的中國神父，差不多都是自己的學生，他們到羅馬參禮，被邀請往臺南服務，他們都愉快地答應了。我到臺南是第一任主教，租了一座房子作主教公署，便開始作事。一面催請被邀的神父回來，一面向國外募捐，興造各項建築。在臺南住了四年又九個月，海外被邀到臺南教區服務的中國神父約三十人，都年輕力強，富有學識。臺南市原有美國神父，臺南縣新營區原有德國神父，誠懇地接受一位中國主教的指導。到臺南的第二年，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開幕，每年到羅馬開會，會期後，到瑞士和西德募款，四年內，臺南的主教公署，主教座堂，碧岳神哲學院，大專學生中心，和幾座本堂區聖堂，先後建立，外形有中國式建築的美觀。年輕神父都是同學，又有師生關係，精誠合作，有理想，有幹勁。一個剛成立的教區表現充沛的活力，興起多種建築，大家嘆為奇蹟。當離開臺南到臺北時教廷大使高理耀大使說：「你留給繼任人的是一個建設完美，神父精神很高尚的教區」。

臺北總主教的工作

民國五十年五月十五日，到臺北就任臺北總

主教職。教區週刊，竟在報上跟總主教的衡陽鄉音打趣了一段。臺北是已經成立十多年的教區，從大陸各省來的神父在本堂區工作，教區的人事和成員都已經有了定型。到任以後，繼續用在臺南的作風，便感到行不通，又當大公會議後，教會改革的風氣也吹到了臺灣；臺灣的社會又從農業進入工業階段，傳教的工作很難推動；已經受洗的教友，受到經濟建設的鼓舞，一心趨向物質建設，所有的宗教熱忱驟然低落；這一現象，大大地影響了神父們的工作情緒。為充實傳教的工作力量，便在修女和教友的培養上着力。在臺北市青田街耶穌孝女會組織了修女講習班，長期授課，繼續了三四年，後來在中山北路中央大樓成立了牧靈中心，開設兩年期的教友修女牧靈學班。最後，輔仁大學附設的神學院敞開大門，招收修女入學。民國六十年成立全國和臺北天主教教友傳教協進會，從訓練和工作兩方面，引導教友參加教會的工作。又加強天主教大專學生的功能，創立青年同工協會，陶冶青年教友的宗教信仰和工作信心。在建築方面，力排眾議，建築了中國形式的總主教公署，落成了規模壯麗的耕莘醫院。當年，對於公署的建築，頗多物議，責難過於富麗堂皇，今天却看到臺北的高樓大廈，鱗次櫛比，使公署似乎成了一座平庸的樓房。昔日物議者，今日面對公署，領首稱善；當耕莘醫院落成後，大家又認為醫院收入過低，債負太重，應轉讓給修會，可是前任總主教田耕莘樞機開始了建造醫院的計劃，繼任者竟不能使計劃完成，未免太對不起田樞機和德國捐助興建醫院的機

構，自己痛下決心，決不轉讓醫院。營造商屢次來索債，逼着出賣在天母的住屋時，不意清查帳目，營造商已經超支，於是更換醫院負責人，派狄剛副主教任院長，吉朝芳神父和郭潔麟神父任業務和總務主任，醫院便不再有虧欠，業務逐漸步入正軌，遂進行第二步計劃，建立耕莘高級護理學校。民國六十六年，狄剛院長升任嘉義主教，袁君秀神父繼任院長，在醫院十週年時，又完成了第三步計劃落成東病房。耕莘醫院目前已成爲規模宏大的醫療機構，造福新店市區的居民。

對於臺北教區的中國神父，自愧未曾細心關照他們，沒有爲他們造福利。眼見他們年歲日長，多已半百，中間又有年屆七十，身體多病的人，於是賣了在天母的別墅住屋，把賣屋所得，加上向羅馬宣道部和德國慈善機構所請的津貼，在耕莘醫院隔街的對面，興建爲老或病的神父安養的靜居樓。當時的計劃，每位在靜居的神父，有一座迷你型的公寓居室，有客廳、書房、寢室、廚房、工友的房间。每位神父可以在房裏開火煮飯，也可以到靜居的公共餐廳用餐。耕莘醫院派護士派醫師照料，負責靜居全部新的傢具設備費及常年經費，靜居本堂區主任神父統籌服侍靜居神父的工作。可惜建造靜居的營造商沒有按時完成建築，未能在離開臺北教區以前，主持靜居落成典禮。

任主教的經驗，甜酸苦辣的滋味都有。在臺南時，因是赤手空拳，乃對天主和聖母瑪利亞具有無限的信心，每天早晚祈禱很久，一件事業完成，又求作另一件的辦法。祈求以後，就一身投

在工作裏，一次在瑞士的冰天雪地裏渡新年，一次在德國的白雪中過聖誕節，一次在瑞士一家一家地收捐款。也不知道錢怎麼來？我一手接來，另一手交給營造商，所有的建築都是天主和聖母的建築。那時的心情是興奮，是創業的心情。又得到神父的同情和同勞，每天聚集在主教公署，一齊用飯，真有家人同樂的愉快。

在臺北的經驗，是奮鬥的經驗，是不斷振作的經驗。對於各方面環境的困難，努力不被壓倒，且奮志向前，即使不能跑，不能走，就是爬也要往前。一個湖南鄉下出生的人，該當知道生活工作的困苦，該當能夠在天災人禍的危難中，可以耕種一塊地就耕種一塊地，決不會像城市裏失意的人，喝酒潦倒，不能自振。這種奮鬥的經驗，平靜了躁急的脾氣，緩和了求事功的性情；尤其加深了對世事的認識，深深體會到聖保祿宗徒所說：「我已經學會了在所處的環境中常自知足。」（斐里伯書第四章第十一節）中庸所講君子素位之道：「君子素往而行，不顧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中庸第十四章）在臺北沒有在臺南時的工作信心，但是承受衝擊和打擊的信心則很強，因爲有耶穌的支持。如同聖保祿說：「因着支持我者，我一切都能。」（斐里伯書第四章第十三節）而且全心相信，天主是愛我的天父，遂安心聽祂的處置。

駐教廷的外交經驗

通常一位神父，沒有外交界的服務經驗，當民國二十八年教宗庇護十一世崩逝後，陸徵祥院長向政府建議派新教宗加冕特使——顧維鈞先生，被派爲特使臨時秘書的是我這位神父。民國三十一年，正在抗戰的艱苦時期，我們政府和教廷建立了外交關係，派謝壽康教授爲駐教廷的第一任公使。謝公使在次年正月間抵羅馬，設館在梵諦岡城內。義大利和中國是交戰國，不許中國使節出梵諦岡城。我當天在羅馬火車站迎接了謝公使後，幫他在梵城內佈置使館，替他和教廷國務院聯絡。在各國駐教廷的使館裏，有時有一位神父任教務顧問。謝公使不信天主教，中國駐教廷使館第一次開館，館中人員對於天主教會和羅馬教廷都茫然不知。謝公使便請他任使館顧問，待遇則是雇員。當時，教廷國務院常務副國務卿孟棟尼蒙席，即是後來的教宗保祿六世，他曾在法學院教了我一年教廷外交史，爲人文質彬彬。孟副卿見到謝公使聘我爲顧問的通知書，便叫我去看他。他說：若是把名字列在外交國名單上，就不能出梵諦岡城。既然我須到傳信大學授課，傳大處在梵城以外，最好的辦法是暫時不在使國名單上列名。這是我對他以後近百次拜會的第一次。在八年以前，我曾拜會他一次，那時他還不是副卿。那一年我國的財政部長孔祥熙先生以特使身份赴英，路過羅馬，我到教廷國務院詢問是否需要覲見教宗。

謝壽康公使爲一位學者，法文的修養最高，

受比國皇家學院選聘為院士。住在梵諦岡城不能出城門，梵諦岡城為步行一小時可以圍繞城牆的小城，城內沒有娛樂場所，連義大利各城星羅棋佈的咖啡館都沒有。謝公使却有兩種娛樂：一種是逛梵城圖書館和博物院，一種是在梵城花園練高爾夫球。

我從傳信大學宿舍搬進梵城的德多義書院，書院為古代德國人來羅馬朝聖的宿舍，後來成了德國神父來羅馬研究學術的住所。那時住在書院的德國神父一律反希特勒，有一位猶太著名的歷史學家被納粹除掉大學教授名義，險被送入死刑的集中營，乃逃到羅馬，住在這座書院裏。傳大中國學生的課，在星期四上午，外國學生的課在星期一、二下午，傳大很近，建在對街的小山上。一星期內的其他幾天上午，到使館辦公。使館那時有參事汪孝熙先生，秘書張嘉瑩先生，還有祇掛名不上班的秘書朱燕先生。中午，大家同使館用飯，謝公使有時自己下廚房煮菜。廚師則是法國僱工留學未成的山東老賀。

使館用中飯時，能聽到許多有關政府和外交的新聞和事故，汪參事是位才子，出身名門，他的父親是汪榮寶，他的兩位哥哥都是外交官，可以說是出自外交官世家。謝公使不是職業外交官，對於外交慣例和外交事務，都尊重汪參事的意見，我那時還算年輕，在汪參事的眼中似乎祇是不足輕重的神父。

那時自己住在梵諦岡常往教廷國務院，和國務院的人員漸漸熟識，他們都是神父，大家可以說是同行，彼此用義大利話可以有話就說。這就

是一位教務顧問的好處，普通一個使館館員往國務院辦交涉，國務院人士以外交官身份接待，以外交詞令答覆。我們見面則因都是神父，都是熟人，可以談家常話，教會的問題是我們自身的問題，討論時沒有一層政治的隔閡。當共匪竊據大陸，政府遷都臺北以後，外交部訓令駐教廷使館與教廷交涉，催促教廷公使黎百里總主教選館來臺灣。政務副國務卿謝爾蒂尼蒙席對向他交涉的教務顧問說：「你是神父應當懂得教廷的立場，教廷的使節不單是聯絡教廷和駐在國政府的關係，也是聯絡教廷和駐在國主教的關係。中國大陸目前教會處在極困難的一刻，中國主教們需要教宗的支持，教宗的公使怎麼可以離開大陸呢？」

抗戰期間，使館因在梵城內，不能有宴會。抗戰勝利了，使館遷入羅馬城，謝公使住在大使館，馬上展開活動。當時教廷保留有教廷貴族，貴族在教廷負有名譽的職務，和樞機們往來很頻繁。謝公使以他的流利高雅的法語，學者的禮貌，週旋於教廷貴族間，成為教宗庇護十二世姪兒姪女的好友。教務顧問幾乎每天在辦公室拿着電話替謝公使和這些貴族接洽約會，為各種宴會排定席次，當我國要爭取第一位樞機時，這些貴族真幫了忙。貴族人士和外交人士注意禮貌，看重座位。宴會席上誰坐上誰坐下，常是天下的大事。自己便養成了注重座位席次的習慣，到現今還改不掉，徒添自己的苦惱。

戰後期間的公使館

謝公使在民國三十五年被調回國，吳經熊教

授繼任駐教廷大使。次年正月二十一日，吳公使抵羅馬。一家人住進一家旅館，佔了一長排房間，吳公使夫婦帶着最小兒子住一房間，七個男孩和吳公使朋友的一個兒子八個人住四間，四個女孩和一個準嫂子，五個人住三間，一共十間房的用費，真嫌大浩大。吳大使吩咐馬上搬進使館，大家臨時擠着睡。立刻又尋找合適的使館房子，一週後就租到了一座昔日曾經住過義大利外交部長的貴族留下的別墅，戰時空空無人住。別墅廳堂大，住房多，花園廣闊，樹木叢茂。祇是房屋顯得老舊，租金不高，稍加修葺，便成為一座雅緻的使館。宴會和酒會都在館內舉行，不假座大旅館。吳公使為一著名學者，信奉天主教很虔誠，內心修養也很高，教廷非常看重這位學者公使，庇護第十二世破例和吳使全家攝影，孟副卿每年一次請吳大使全家人到他家參加彌撒祭典，同用早餐。吳大使平居研讀聖經，常手不釋卷，當時法國駐教廷大使馬里且為當代哲學大師，他的夫人也擅長哲學，和吳大使交往很密。吳大使携來他奉先總統 蔣公囑託翻譯且經 蔣公親手訂正的新經譯本，和教務顧問一同作最後的修正，常向聖經學者請問高見。孟卿通常每星期六接見外交團，吳大使常派教務顧問往見。照例公使讓大使，代辦讓公使，有些中南美的大使，故意到的晚，在家裏吃了午飯纔來，我還是要讓他先見。當孟卿開門送走見畢的最後一位公使時，輪到我往見，他便握住我的手說：「啊，這是中國——連累你等了那麼久！」他臉上常是微笑，坐着細心聽我的話，有時他真累了，閉上眼睛，當

要答覆時，或要多加說明時，就睜開眼。他的答話常是明瞭清楚的，可以辦的事，就答應辦。若他沒有答覆就說到另一事，便知道那樁事不能辦。他從來不敷衍，或含糊，或模稜兩可，而且常彬彬有禮。吳使離羅馬以後，朱英先生任代辦，每星期仍由教務顧問前往拜會副卿。孟卿後來升任米蘭總主教樞機，我離羅馬到臺南就職時，路經米蘭，去拜會他，他表示很親切，邀請用飯，贈聖爵一尊。他當選教宗後取名保祿六世，由國務院常務副卿德雅瓜總主教以新教宗任內第三號函答覆我曾祝賀他當選的信。保祿六世在位十五年，每年我赴羅馬開會，每年晉見，每次都談中梵邦交。一次，保祿六世懇定地說：「你放心，有你這一位，我們的老朋又在臺北，我們決不會放棄臺灣。」這句話份量真太重，我聽後感激激流淚，當教廷要調駐華大使葛錫她總主教往駐孟加拉，不另派駐華大使時，我適在羅馬兩次晉見保祿六世，又呈上一書，建議以葛大使為兼使，最後，保祿六世很慎重地說：「好罷！大使給你們保留」。又值教宗決定往訪香港時，力爭來訪臺灣。保祿六世堅持到香港向中國人講話，遂祇好請教宗不向大陸中國人說話，而是向亞洲區所有中國人發表廣播詞。

當時教廷的政務副國務卿達爾蒂尼，口直心爽，不拘小節；前往拜會的次數不多。達孟西副卿，後來升代理國務卿。繼任的常務副卿德雅瓜總主教政務次卿撒慕肋總主教和我年齡差不多，談起話來更自由。這兩位副卿陞樞機後，繼任的副卿彭能里總主教和加撒洛里總主教也是舊日相

識。保祿六世的最後常務副卿高理耀總主教曾任駐華大使，交情很深。

十八年的時間，在駐教廷的大使館服務，熟識了教廷國務院的人員和外交慣例，也認識教廷的外交原則。對於教宗宮廷的禮規和習慣，也熟識不少。只是到現在又過了二十年，許多人事和禮規都改了，所有老友已經不多。

在駐教廷使館時所接觸的另一教廷機構，乃是宣傳信仰部，簡稱傳信部或宣道部；我既是傳信大學的學生和教授，傳信大學就是傳信部所辦，當時傳信部長剛恒毅總主教兼任傳信大學校長。剛總主教曾任教宗駐華代表十一年，開啓了中國天主教會的新時代。他對中國教會主張兩個原則：第一，任用中國教士為主教；第二，尊重中國文化。我那時往傳信部就像到自己家裏，上下的人都熟識。我到羅馬留學，是剛總主教在北平時所派的；我任傳大教授，是剛總主教在傳信部時所任命的。剛公就像父親對兒子一樣的愛護。當神學畢業，衡陽主教命我回教區，剛公說：「你留下讀法律，我給你的主教寫信。」有一次他打電話叫往見，輕聲說：「有人控告你，我相信你，你小心點就是了。」當我政府遷到臺灣，首先幾個月使館領不到經費，剛總主教自動向孟棟義副卿推薦我到國務院任職。後來他告訴我這件推薦事，說孟卿答覆，以國務院的人事照例由最低級按年級往上升，當時我的年齡已在三十以上，不能從最低級職員開始。我當然很感激剛公的一片好心。

剛總主教升樞機時，年已七十八歲。他生平

最不喜歡人公開稱揚他，也不愛慶祝會。升樞機後，我請他接受在羅馬中國人的慶祝會，他說：「別的慶祝會和頌詞，都不免逢場作戲，你們的慶祝會是出自一片誠心，我來接受你們的慶祝。」五年後，他因心臟病去世。

大公會議傳教委員

民國五十年，若望二十三世籌備召開第二屆梵諦岡大公會議，這是天主教會一樁莫大的事件，已經一百年沒有召開了。若望二十三世的行動，常似一種靈感性的，不經過一層一層的教廷各機構的研究，突然就宣佈了這樣重大的事務。但他肥胖身體的步履，強健而腳踏實地，不慌不忙組織了籌備委員會。籌備會竟有我這一位平常的神父。一年後，若望二十三世召開了大公會議，聚齊了全天主教會的兩千多位主教到梵諦岡開會，我剛受任為主教，被任命為大公會議傳教委員會委員，又被選為副主任委員。年剛五十歲，衝勁頗大，又因十八年習慣用拉丁文教書，在委員會裏隨便發言，和幾位年輕的主教，批評傳信部缺乏主動精神，因而開罪當時傳信部長兼傳教委員會主任委員雅靜安樞機。全中國參加大公會議的主教共六十多位，住在一座旅館裏，我則住在自己原有的住屋，中間距離很遠，我很少到中國主教的旅館。田耕莘樞機被中國主教推為團長，于總主教為副團長，我為秘書長。田樞機第一年來參加大公會議，住在城外的聖言會院。第二年也來了，參加會議的次數不多，第三第四年因病就沒有到。為主教團的事，因着路遠，我不常到

中國主教旅館跟大家商量，因而就招惹主教們的不滿。最後第四年閉會之前，旅館中的主教主張組織一長久性中國主教團，全體主教作團員，也擬定了章程。中國的主教那時都被共匪驅出大陸，分散在歐美各國，祇有臺灣的主教，固定地為中國教會工作。傳信部和教廷大使高理耀總主教不願意成立這種主教團，怕將來在臺灣的主教因着教務要開會時，常不能有這個主教團的法定人數。自己也便表示不贊成。主教代表約我去拜會傳信部次長西奇斯孟棟總主教，我祇站在門外。他們談話後出來，面色嚴肅，不言不語，便知道他們沒有說服傳信部次長，竟遷怒於我，怪我獨立獨行。後來事實證明他們的想法不合實際。

大公會議每年秋冬有兩個月的開會期，委員會則在春夏時開會。因委員會多，問題複雜，大會主席團決定除討論教會性質、主教任務、禮儀、教會在現代的責任外，其他各委員的問題都從簡，所有提議案縮為簡單的提案。傳教委員會按着指示寫成了提議案，由副主任委員在大會提出，六百多位的傳教主教先後發言，以傳教為教會首要責任，提議案若是簡單，不能接受。雅靜安樞機遂決定委員會自動收回議案，不付表決，等到重擬一新議案後，再提交大會討論。

大公會議所留下的經驗是唯一的。同全球的主教共處一堂，討論全教會的大事，都用一種語言，都有同一的目標，在不同的意見中，結出同一的結論；雖也有舌戰的情況，大家仍保持兄弟的情懷。

修訂法典與主教團

大公會議後，保祿六世亦即成立了四種新機構：教會法典修改委員會，為基督信仰者委員會，為非基督信仰者委員會，為無信仰者委員會。臺北總主教竟被任為三委員會的委員；參加法典修改，為非基督信仰者，為無信仰者的三個委員會。法典修改委員會的工作，艱巨而長久，每年去羅馬開會，開了十年，工作始告竣工。會後送交各主教團審查，詢問意見，又過四年，今年若望保祿二世可能公佈這部新法典。委員會的任期以五年為期，最長可任十年。法典修改委員會的職務，則到法典公佈時纔完。

在大公會議後，亞洲主教們提議組織亞洲主教團協會。開始時，我不贊成這種理想，因亞洲各國的天主教會所處的境遇不同，不能有具體的合作計劃。乃向一國際新聞社表示意見，香港徐承斌主教任這新組織的秘書長立刻要求我澄清立場，怕加重傳信部的反感。我答以祇是私人意見，大多數主教若贊成，自己必定贊成。後來自己不但贊成，一開始就加入工作隊，任常務委員會委員，兼宗教連繫委員會主任委員。在徐主教去世後，任代理秘書長。民國六十三年，在臺北召開第一屆全體代表大會，使亞洲的樞機和主教團代表都來認識臺灣。自己又到東京漢城參加區域性會議。民國六十七年，亞洲主教團協會第二次全體代表大會在印度加爾各答開會，我任召集人。常務會職務任期滿後，仍任宗教連繫委員會主任委員一職，自己不喜歡旅行，出國開會也非所

好，前年三次出國到泰國、馬來西亞主持會議，又到馬尼拉開會，自覺身體精神交瘁；但這種為全亞洲天主教的服務，使自己認識亞洲各國天主教情形和心理，收穫良多。

教育文化社會服務

已經快三年了，自己繼于斌樞機出掌輔仁大學，在中國社會上接受多方面的文化工作。承蒙各界以愛慕于樞機的心情相待，邀請參加文化組織，範圍大的有：文化復興委員會、大陸救災委員會、反共聯盟、行政院的青年輔導諮詢委員會、教育部的學術評議會、大專聯考委員會、孔孟學會，範圍小的有：新聞局的電視評議會、新聞界的新聞評議會、國父紀念館管理委員會、中山文化基金理事會、中國哲學會、船山學會、中國易經學會，去年選加上臺北市選舉委員會，各種組織開會的次數雖不多，加在一起，次數就不少了。然而自己不敢推辭，而且有人邀請演講或寫文章，常勉力為之。最苦痛的，則是教育部和文復會請審查學術著作，學生請指導博士論文，自己從不敢想有多大學識，而是別人邀請服務，一個獻身於基督的人，怎好辭卸不接呢！能有機會和學者們及社會工作專家們交換意見，聽取他們的見解，也是人生一種樂事，教會人士常說于樞機和我倆人的看法和作風，跟別的主教神父不同，或許是因為我們倆人跟社會人士較比跟教會人士接觸的更多，不知不覺地染上了社會人士的風氣。

輔仁大學現在是自己正式工作的園地，孟子

曾說聚天下英才而教之，為君子三大樂事之一，不願和做皇帝的人互換，我喜愛青年學生，跟他們多接近，參加他們的集會，邀約班代表和社團總幹事聚餐，聽取助教們和研究生的苦衷。自己又教書，又兼文學院院長，願意明瞭學校各方面實際情況。在訓導上主張嚴，在學術上主張加緊催促上進。自己的心則是希望學生養成獨立的人格，知道肩負責任。自己雖是校長，仍舊還是主教，主教乃獻身基督的人，基督把學校託付給我，我便獻身於學校。

堅守正名思不出位

對於工作常有兩個原則：一個是堅守正名，一個是思不出位。孔子曾教弟子正名，有什麼名份，就盡這名份的責任；而且要實現這名份的內容，按照這個原則，做神父就做神父，令人看出來是神父，衣着方面也有神父的衣着，在何地方也不改裝。做主教就做主教，態度和言談，令人知道是主教，並不要打架子。建主教公署，就是主教公署，建主教座堂，就是主教座堂，從不苟且敷衍。建築的計劃，應顧到五十年後，因為建築物不僅為目前，還要為將來用。在就任臺北總主教的教友歡祝會上，方豪神父曾致詞說：「羅主教是實事求是的人，做主教就是做主教，畫馬就是畫馬。」思不出位，也是孔子的教訓。已故傳信部部長畢翁諸樞機雖不是多才多學的人，然而具有豐富的做人經驗，曾教訓傳信大學的學生說：「你們將來一生，離開一個職務，不要再想那個職務；離開一個本堂的主任職，不要再回

那個本堂去；離開一個教區的主教職務，不要再回那個教區去；讓你們繼任的人，自由地管理本堂或教區，不常有你們的陰影」。這種教訓就是思不出位。離開了臺南教區，便不回臺南；雖然那邊有些好朋友。離開了臺北教區，就不回臺北教區；雖然仍舊住在臺北。自己六九望七和七十壽辰，教友要聚餐，也特別囑咐莫邀請神父。都是為避免兩教區的神父，來談論教區事，引起自己發表意見，而使人不安。自己曾多次有過這種聽人傳話的經驗，當然不必計較，但總覺多一番困擾。

在工作方面的缺點很多，產生一些誤解，有人說是獨裁，有人說是好大喜功，自己在工作上只看事不看人，不講人際關係。最近閱讀一册教廷已故達爾蒂尼樞機傳，達氏批評已故國務卿嘉思巴里樞機說是一位偉大的工作者，有魄力，有見識，對於屬下的工作，要求很嚴。當屬下做完所吩咐或所託付的事，從不說一句感謝的話，認為做事為理所當然。讀這評語時，心想是不是這些話會貼到自己身上。

對永恆生命的體驗

小的時候就背熟了光陰如白駒過隙，大了以後又體會到歲月如江水東流不復返。

現在老了，更覺生命的可愛。可愛的生命，不是白駒過隙的歲月，而是永遠常存的精神。基督曾說祂是生命，又曾說祂來為給世人新的生命。基督的生命，乃是永久常存，無量無限。愛永久的精神生命，則對於如同白駒過隙或如江水東

流的世物不為所拘。中國古人說役物而不為物役，為名所役，為位所役，為利所役，都不能固定於永恆的生命。

我七十歲的箴言：

「七十歲認為生命重新開始，自己七十歲的新生，是和基督共同生活的生命。

新生的第一種體驗，是天父的父愛。

新生的第二種體驗，是對世事不動心。

新生的第三種體驗，是一切為孝敬天父。

新生的第四種體驗，是以基督之愛愛人。

新生的第五種體驗，是同基督為救世而肩負十字架。

朱熹曾說：「古之學者，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文集卷七十四策問）

民國七十年二月十九日農曆元宵節

關山煙塵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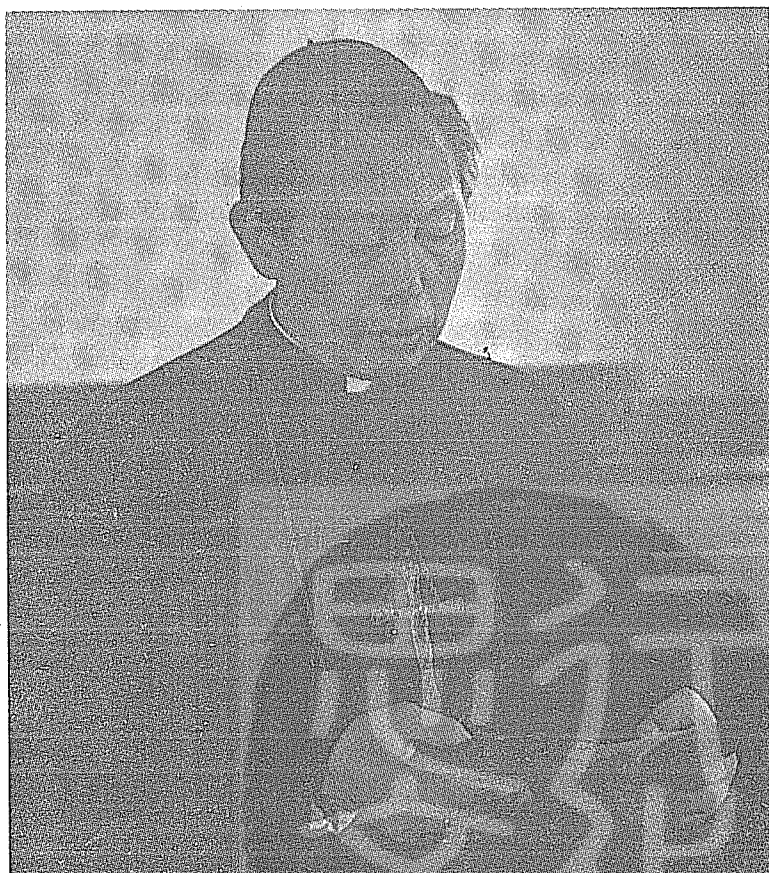
喬家才著

全書陸百多頁四十餘萬字穿線平裝
定價壹佰陸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
姓名，附郵票壹佰陸拾元寄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寄書（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元）。

羅光「七十自述」插圖

上圖：著者潛心研讀聖經時的神情。

下圖：著者作畫時留影。





上圖：著者（前排左二）早年與自由中國主教團全體總主教合影。前排中坐者為于斌總主教。下圖：著者（右）在羅馬聖彼得大殿前留影。